

西夏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史景娴 崔明德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5)

〔摘 要〕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政权建立后,治内民族众多,各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外一方面与辽、宋争立正统,另一方面又有被辽、宋、吐蕃三方夹击的危险。从整体来看,西夏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李氏除了继承前代中原地区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之外,又结合自身的民族特性,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作了新的认识和总结,形成了西夏独特的民族关系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蒙元统一全国有着借鉴意义,而且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西夏;党项;民族关系思想

〔中图分类号〕K 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12) 03-0055-12

西夏立国 190 余年,其东北有强大的契丹,其东南是北宋,其西南为势力不容小觑的吐蕃和回鹘,西夏统治者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目前,学界已对西夏的民族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对具有指导意义的民族关系思想,则缺乏足够重视与系统研究。本文拟分前期、中期和末期三大阶段,对此作些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能引起学界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一、西夏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西夏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丰富多彩,其中以李继迁、元昊和张浦的思想最具代表性。李继迁是西夏的开拓者,奠定了西夏民族关系思想的基调;元昊是西夏的开国皇帝,为西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张浦是西夏历史上汉族士大夫的杰出领袖,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服务西夏的典型。

(一) 李继迁的民族关系思想

文献中对李继迁民族关系思想的直接记载较少,但从其各种实践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其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轮廓。总的来看,李继迁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重要观点:

1. 反对“宗族尽入京师”。李继迁虽然当权,却无法解决族内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982 年,为了寻求支持,李继迁把银、夏、绥、宥、静五州的土地献给北宋,党项羌自此失去自唐以来居住的土地。按照北宋的规定,李继迁五族人必须去开封任职,从而引发党项内讧,表现尤盛者为李继迁。他认为“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①虽然他后来听取张浦的意见,避走漠北,但是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思想已显现无遗。一年后,李继迁等在宋朝受命为官,李继迁感慨道:“世泽长存,祖功未泯,人心思旧,蕃部乐推,不望通显皇朝,但假余生戎落,克遂肯构肯堂之志,常为不

〔收稿日期〕2012-02-24

〔作者简介〕史景娴(1985-)女,山西晋中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崔明德(1959-)山东莱西人,民族学博士,烟台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侵不叛之臣。”^①在被曹光袭击失败后,他对蕃族部落说“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而等不忘先泽,能从我兴复乎?”^②由此可见李继迁恢复祖辈世居领土的宏图大志。宋将田仁朗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继迁得部落情,愿降优诏怀来之,或以厚利啖诸酋长密图之。不尔,恐他日难制,大为边患”^③。

2. 与辽联盟,“假其援助,以为后图”。西夏部族势力本来就比较弱小,李继迁又把五州之地献给宋朝,无疑使势单力薄的党项族雪上加霜。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李继迁充分认识到“弱能假强,寡能假众”^④。按照这一思想,李继迁采取了两个步骤:首先在攻取宥州时,积极争取戎落之众。他“恃横山为界,若诱诸部并力图之”^⑤。李继迁攻取宥州,戎族部落起了很大作用。其次在避走地斤泽后,李继迁采取各种手段尽力笼络党项各部,“党项咩嵬族请附”,“羌族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⑥。但是,李继迁在浊轮川失败后,宋将郭守文出击夏州,蕃族皆破。李继迁发现“弱能假强,寡能假众”思想无法继续发挥作用,遂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将这一思想发展为“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⑦,最终臣服契丹的思想。“继迁见诸部落溃散,谋于众曰‘吾不能克服旧业,致兹丧败,兵单力薄,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乃遣张浦持重币致契丹请附,契丹主隆绪意未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言‘河西为中国右臂,向年府州折氏与银、夏共衡刘汉,致大兵援应无功。今李氏来归,国之利也,宜从其请。’契丹主纳之”。^⑧并于同年,授继迁为定南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为了进一步拉近与辽的关系,李继迁亲自向辽请婚,并表达“愿婚大国,永做藩辅”^⑨的决心。辽圣宗“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订封义成公主下嫁继迁。”^⑩此后党项族的威望大增,取得了“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⑪的显著效果。事实证明,李继迁的“假其援助,以为后图”思想是正确的,为党项立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3. “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鹑锐兵,然后长驱南

牧”。李继迁的“西掠”、“北收”和“南牧”战略蕴涵着“大一统”思想。当然,他当时的“大一统”范围主要是统一西北地区,借此壮大实力,然后实现更大范围的统一。在李继迁的思维中,主要是通过武力征讨的方式实现他的一统理想。但是,由于他在咸平四年(1001年)再次进攻吐蕃流谷部时,不幸被潘罗支射杀,“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⑫的思想最终没有来得及实践。

李继迁民族关系思想的最突出特点,就是高度的灵活性。他始终能够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采用武力与和谈的方式,积极推行“远交近攻”的策略。他认识到联辽只能得到政治上的支持,经济上却得不到多少好处,而讨好宋朝,则能得到“岁赐”。所以,待宋朝护送诸父昆弟归朝之时,他能“策其群力,激羌戎以先烈,约契丹为强援”;待势力稍微壮大时,他能“控弦灵武,扼平夏之要冲,驱马凉州,成河西之右臂”,终于使“五州尽复,诸族慑从,逆者攻以兵,顺者役其众”,开拓万里疆土,为后世的立国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朝李纲就曾经指出:“夏人狡狴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弱固有之,以故数十年西都用师,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领”^⑬。李纲虽站在汉族立场上看待这一问题,但却看出了李继迁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灵活性。

李继迁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个人政治天赋有关,也是当时内外形势所致。首先是宋朝的民族政策不当。宋太宗为了控制李继迁,对党项族采取了经济封锁的政策。他利用陕西转运使郑文宝的建议,禁止西夏盛产的青、白盐入境,后又禁止中原粮食进入西夏。青、白盐价廉味美,宋朝边境百姓喜食。然而,宋朝统治者却不顾百姓生活需求,规定凡属私市者处死。禁令实行不久,双方边境居民由于无盐无粮,违禁者日众,以致沿边熟户投奔于李继迁。宋朝不仅没有增加收入,反而激化了汉与党项之间的矛盾,将已经内属宋朝的党项居民又重新推

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龚世俊等校证,第39页。

②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4,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③ 《宋史》卷275《列传第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381页。

④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龚世俊等校证,第40—41页。

⑤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龚世俊等校证,第40页。

⑥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4,龚世俊等校证,第43页。

⑦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4,龚世俊等校证,第47页。

⑧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4,龚世俊等校证,第47页。

⑨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4,龚世俊等校证,第47页。

⑩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6页。

⑪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4,龚世俊等校证,第51页。

⑫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7,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⑬ 戴锡章《西夏纪》卷28,罗矛昆点校,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77页。

向了李继迁,使李继迁势力日益坐大。其次是契丹的暗中支持。契丹意欲联合西夏对宋形成掎角之势,造成三者相互制约的局面,于是不仅暗中册封李继迁,给予帮助,并与西夏和亲,将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对其赐马三千匹。由于有了强大的契丹为后援,李继迁的力量日益壮大,出现了“兵势稍振”、“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①的局面。因此,宋及辽各自实行的民族政策对李继迁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影响。

(二) 元昊的民族关系思想

1. 强化民族特色。元昊自幼就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认为“戎人”不能处处模仿汉人,不能丢失民族特点。在其十余岁时,他见父亲德明用马交换汉族物品,便谏言“吾戎人,本从事鞍马,今以易不急之物以非策,又从而杀之,则人谁肯为我用乎?”^②元昊长大成人后,对父亲的臣宋政策日益不满,曾多次规劝其父不再臣服宋朝。他说“吾部落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箭。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衣毛皮,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霸王耳,何锦绮为!”^③在德明去世后,元昊更是进行了一番突出党项民族特点的改革。

其一,改姓氏。元昊废除了自唐宋以来中原王朝赐封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认为这是党项族自有的姓氏,具有特权。元昊自称“吾祖”,后又称“兀卒”,称自己为“青天子”,中国皇帝为“黄天子”,表示自己具有天子可汗至尊。

其二,秃发令。党项人原先是披发或蓬首,迁到银夏地区后和当地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融合杂居,发式也不很严格。元昊为了区别他族,保持旧俗,率先剃光头顶,耳戴重环饰。1033年,元昊欲革银、夏旧俗,向境内的党项人民下达了“秃发令”。他命令党项部族仿效他的发式,限期三日,有不从者斩,借此提高本民族独立意识。

其三,别服饰。元昊不再模仿中原服饰,为有别于中原帝王将相,又区别于一般的党项贵族,在宋封他为西平王之后,就开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其下级官员,也按照等级和职别规定服饰,“文资则幘头、鞞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缕冠、黑漆冠,衣紫旋兰,

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鞬,马乘氈皮鞍,垂红纓,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栏,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④

其四,制蕃书。最能体现元昊强化民族特色的改革是创造文字。党项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一直都使用汉字。元昊继位后,认为创造一种能够表现党项特征的文字势在必行。他亲自主持该项工作,命野利仁荣加以演绎,编纂十二卷,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西夏文字。元昊力推此种文字,在国家政府机构中设置“蕃字院”和“汉字院”。被选拔入院的既有党项人也有汉人,他们既学蕃书也习汉字。在蕃、汉二字院中供职的官员还要负责执掌对外国的往来文书。通宋朝的公文,中书汉字,旁边辅以蕃书,由汉字院担任撰写;对吐蕃、回鹘、张掖、交河等的文书,则用“蕃字”书写,旁边辅以其他各国文字,由蕃字院负责撰写。创制蕃书不仅有利于强化内部统一、巩固国家政权,而且也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史上一颗璀璨明珠,使得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获得生命力和活力。

其五,定礼乐。元昊继位后,使党项的礼乐制度恢复为党项族崇尚武力的风格。他对野利仁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缠节繁音,吾不取焉。”^⑤并以符合党项族精神的“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讲究实效的原则来指导礼乐制度的改革,裁九拜为三拜,革五音为一音,简化了礼乐制度。

其六,建蕃学。夏州自五代之后就便不列职方,其官属来源不是土族相传就是幕府迁擢,尚无汉族科举取士之法。元昊意欲“以胡礼蕃学抗衡中国”^⑥,因此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持该项工作。并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大量儒家经典为蕃文,选拔蕃汉官僚子弟优秀者入学教之,学成之后,出题试问,观其考核情况,所对精通,所书端正者,授以官职。遂成为西夏科举之始。

从以上改革措施可以看出,元昊竭力保持自身民族特色,其治国理念尚在游牧文化层面,草原观念比较浓厚。如党项“每出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而食,割鲜佐饮,各问所见,择其所长”^⑦的习俗就一直保存下来。然而,元昊本身又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他在排斥汉族文明的同时,汉族文化实际

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4,第51页。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3993页。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3998页。

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3993页。

⑤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12,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

⑥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13,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52页。

⑦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3993页。

上已渗透到他的改革措施之中。如“别服饰”中“民庶青绿,以别贵贱”,无疑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外显化。“制蕃书、建蕃学”,学习《尔雅》、《孝经》等儒家经典,是儒家思想在党项中的渗透。总之,拒绝与被动接受汉文化贯穿于元昊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尽管如此,我们应对元昊强化民族特色的思想与实践给予客观评价。一方面,这些改革在当时民族融合的大潮中保持了自身的民族特色,尤其是西夏文字的创建,使独具特色的党项文化得以传承;另一方面,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大势,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元昊的制蕃书等,本意在于“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客观上却促进了党项族的封建化进程。

2. 汉化思想。党项族从唐末迁夏州近200年中,始终处于中原文化的包围之中,深受汉族生产方式及封建文明的影响。元昊虽然实行了一系列强化民族意识的改革,但在西夏封建化道路上,并没有起到多大阻碍作用。西夏社会的封建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整个国家陷入了“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立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①的逻辑链条之中。这一现象表明,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来看,西夏社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汉化了。不过,在汉化之路上,元昊的开明之处在于他既能注重本民族独立和发展传统文化,又不墨守成规,注意吸收中原文化,并把许多优秀的文明成果纳入政治体系中。惟有如此,西夏政权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仿效中原王朝建都城、设官职。公元1033年5月,元昊升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广建宫城。兴庆府的规划布局及名号完全仿照唐都长安、宋都东京。此外,元昊还仿照宋朝设立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等官职。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九月,元昊又对官职进行了部分调整,以“中书不能统理庶务”为由,仿照宋朝增设尚书令,改宋朝二十四司为十六司,隶尚书省,分理六曹。夏朝官职自此逐步完善。

3. 正统思想。元昊与历史上许多其他少数民族首领一样,认为自己属于正统,并且寻找各种依据支持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宋王朝展开争立“正统”的拉锯战。元昊于称帝次年,就派遣使者到宋朝上表,阐明他建国称帝的合法性及正统性。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

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时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崖妳奉表以闻。^②

我们知道,一个新的政权及其统治者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总会在正统方面大做文章,甚至攀附高门世族。元昊也不例外。他自认拓跋鲜卑之后,为自己立国寻找根据。元昊还认为党项族是可以与中原王朝相互比较的先进民族,不必非要称臣,可以南面称孤,建立国家,与宋、辽等邻国保持友好平等关系。

元昊称自己的国家为“白上国”,也体现了其正统思想。以“白上”为国名这一说法,与我国的阴阳五行说有密切关系。吴天墀先生认为,汉族的阴阳五行观念给周边兄弟民族以一定影响。我国各族中普遍存在这种五行观念。大家普遍认同西方属金,金为白色,借“白上”来提高自身地位。西夏统治阶级利用这一学说,宣称自己的政权拥有西北地区,是一个属金而尚白的国家,以此得到辽、宋公开承认其“西朝”对等地位,促成新的鼎立格局形成。这样就可以改变过去向辽、宋称臣的藩属地位,提高统治力量,与宋、辽维持新的平等关系。^③

元昊的正统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其他民族的歧视上。历史上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当文明达到一定高度时,都会认为本民族是最先进的民族,其他民族为“夷狄”,党项族也不例外。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西夏文字中,汉族的“汉”由“小”和“虫”组成。此外还把吐蕃称为“戎羌”,认为契丹、回鹘等是“夷”。这都体现了元昊不平等的民族观。

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元昊能吸收和借鉴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367页。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3995页。

③ 吴天墀《吴天墀文史存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5-286页。

历代汉族思想家、政治家的思想成果,并将其融会贯通,形成了比较精深的民族关系思想。元昊民族关系思想最大闪光点,在于他非常注重保持党项族的民族特色,发展本民族文化,发扬本民族传统。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使党项族作为一个鲜明的个体而熠熠生辉,为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增添了一抹浓重的色彩。元昊的思想不仅对其以后的统治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三) 张浦的民族关系思想

由于种种原因,一批汉族士大夫入仕西夏。元昊称帝时,“以野利仁荣、嵬名守全、张陟、张降、杨廓、徐敏、张文显为中书、枢密、侍中,专主谋议;以杨守素、钟鼎臣、嵬名聿荣、张延寿等为官计,受纳诸司、主文书;……”^①其中张陟、杨守素等皆为汉人。元昊在法律条例中明确规定汉人可以担任官职,于是一大批汉人纷至沓来,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西夏上层发挥巨大作用。其中尤为突出的便是张浦。张浦一生“事继迁、德明两世,忠诚练达,知无不言。”^②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为西夏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 “羌不习战,走避漠北”。李继捧把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献给宋朝后,李继迁就想夺回五州之地。其族弟李继冲也主张“乘夏州不备,杀诏使,据绥银。”然而素有战略思想的张浦却认为“夏州难起家庭,蕃部观望,克文兼知州事。尹宪以重冰屯境上,卒闻事起,朝发夕至,银州羌素不习战,何以御之?”进而建议“走避漠北,安之家室,联络豪右,卷甲重来。”^③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正确策略。张浦长期生活于汉羌交叉地带,目睹党项人受汉族统治者残酷欺压的现实情况。他期望党项族获得独立,摆脱汉族官僚的奴役。因此,他“联络豪右”,以党项独立为目标,以共同反宋为旗帜,最终实现党项人的政治独立。由于这一思想代表当时屡受欺压的党项人的意愿,引起共鸣,从而出现“从者日众”的局面。“走避漠北”并不是退回到沙漠以北不再进取,而是伺机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做到“广积粮,缓称王”。张浦以此思想为指导,积极辅佐李继迁成就一番霸业。985年春,银州党项酋长拓跋迁与李继迁联络,企图里应外合攻下银州。李继迁犹

豫不定,张浦劝谏说“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并且亲自制定了诈言投降、诱敌深入的方略。按照这一思路,李继迁诱杀宋朝老将曹光实,并攻下银州,获得了避走地斤泽后的第一个根据地,有了稳定的后勤保障资源。面对胜利,张浦沉着冷静,认为反宋建国的历程还很长,尚需进一步努力。因此,他劝谏李继迁“自夏州入觐,无复尺疆,今甫得一州,遂尔自尊,恐乖众志”,不如“预署酋豪,各领州郡,使人各自为战,则中国疲于备御。”^④这无疑是给李继迁一支清醒剂,推动他不断发展建国事业。

2. “避战求和”。张浦是西夏一位重要谋略官,也是一位出色外交家。由于他是汉人,深谙汉人礼制,因此对宋的外交活动,多由他负责。当时李继迁势单力薄,缺乏外援,在与宋作战中屡屡失败,形势极为不利。张浦从党项利益出发,步步与宋周旋,从而形成了“避战求和”的思想。至道元年(995年),李继迁认为与宋对抗的条件尚不具备,决定向宋称臣,以待进一步发展,便派张浦入宋进贡。张浦身负重任,深知赴宋目的,总是以“和”来巧妙避开北宋之锋芒。宋太宗在崇政殿召见张浦,并设立卫士挽一石六斗的硬弓,以之来羞辱西夏。宋太宗轻蔑地笑着说“戎人敢敌否?”张浦为了求和缓兵,故意扮演弱者,巧妙地奉承宋太宗“蕃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人固已逃遁,况敢据敌乎?”^⑤张浦的求和思想,为李继迁下一次军事行动赢得了宝贵时间。张浦的“避战求和”思想不仅在李继迁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影响着德明的外交政策。公元1004年,李继迁临终之际对张浦说“公等并起等夷,谊同兄弟,孺子幼长兵间,备尝艰苦,今俾以灵、夏之众,虽不能与南北争衡,公等戮力辅之,审识时务,或能负荷旧业,为前人光,吾无憾矣。”^⑥德明新立,张浦托孤受命,地位愈加显赫。德明继位后,西夏元气大减,国危主幼,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环境以恢复自身力量。为此在对宋和与战的问题上,张浦坚持以和为主,并一再敦促德明迅速与宋讲和。经过两年讨价还价,夏宋双方订立合约。合约的签订对于刚刚兴起的西夏政权起了稳定作用。德明统治20多年,西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很大发展,张浦的作用毋庸置疑。张浦死后,德明“临其丧,哭之恸”,其君臣之情可比李世民之敬爱魏征。

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12,龚世俊等校证,第149页。

②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9,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③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龚世俊等校证,第38页。

④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4,龚世俊等校证,第44页。

⑤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3987页。

⑥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8,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二、西夏中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西夏中期,帝党和后党之间围绕夷夏之辨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必然影响到双方的民族关系思想。帝党主张“以夏变夷”,后党则主张“夷夏对立”。“以夏变夷”强调党项汉化,谅祚要求“去蕃就汉,行中国礼”;乾顺通过“封王固权”、“建立国学”等措施来推行;而仁孝则是全方位与封建文明接轨,将“以夏变夷”推向高峰。后党针锋相对,处处强调“夷夏有别”。如梁太后“废汉行蕃”,任得敬则抛出“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竽,靡廛禄以恣其冗食”的论调,要求废除汉化措施,恢复奴隶主统治。两种不同的思想展开长达百年的斗争,最后由于“以夏变夷”思想符合民族关系发展主流而获得成功。

(一) 帝党的思想

1. 谅祚“去蕃就汉,行中国礼”。元昊死于宫闱,在传位问题上,皇族与后族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元昊临终前,遗言立其弟委格宁令为帝。众人欲遵元昊遗囑行事,唯有没藏讹庞以委格宁令既非元昊之子,又无功德为由坚决反对。经过一番斗争,讹庞胜出,立尚在襁褓中的谅祚为帝。谅祚继位年仅周岁,母没藏氏为皇太后,没藏讹庞为国相。国家大权落入此兄妹二人之手。没藏讹庞执政后,飞扬跋扈,不断侵扰宋朝耕地。宋为此与西夏断绝互市,致使西夏资源匮乏,国人多有怨言。此外,由于其独断专横,与以谅祚为首的皇族产生了深刻矛盾。谅祚自感危殆,于是利用权臣不满,寻机诛杀讹庞,并清除其余孽,结束了西夏历史上第一次后党执政。年仅14岁的谅祚开始亲政。谅祚为了巩固西夏政权与自身地位,上台伊始就采取全面吸收汉族文化的措施,“尊大汉礼仪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华风”^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采用汉族衣冠。夏懿都五年(1061年)十月,“窃慕中国衣冠,今国人皆不用蕃礼,明年将以此迎朝使,仁宗许之。”由是始行“去蕃就汉”^②。同年十一月,谅祚再向北宋上表请求,“本国窃慕汉衣冠,今国人皆不用蕃礼,明年欲以汉仪迎待朝廷使人”^③。仁宗许夏国采用汉族衣冠。

其二,向宋求取儒家经典。夏懿都六年(1062年)四月,谅祚“进马求赐书”。谅祚献马五十匹,表求宋太宗御制诗草、隶石本,欲建书阁宝藏之;并求

《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中国正至朝贺仪。宋仁宗赐以《九经》,还所献马。^④如此大规模地向宋朝求取儒家经典,这在西夏历史上尚属首次,由此可见谅祚对追求汉文化的迫切心情。

其三,仿照汉族王朝官制,完善中央官职。关于谅祚增设的官职,《西夏书事》卷20记载得比较详细:“(西夏懿都六年五月)备官制。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蕃设昂聂、昂里、谟箇、阿泥、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丁奴诸号。”上述官职尤其是汉设官职,在元昊时代均未出现过。元昊只是在建国次年曾“仿宋制,置尚书令”。谅祚所设官制,完全仿照中原王朝,比元昊时期的官制更加完备。

其四,重用汉族有才华者。拱化二年(1064年),“陕西人景询以罪来投,使为学士。谅祚每得汉人归附,輒工起居,时致中国物,娱其意,故近边蕃汉乐归之。掠秦凤时,俘汉人孙立,授以官,颇用事。询,延安人,小有才,得罪应死,亡命西奔。立荐之,谅祚爱其才,授学士,日夜谋伺边隙。英宗令捕系其孥,勿以赦原”^⑤。学士一般由皇帝的亲信且有文采者担任,景询因避难到了西夏即被谅祚授为学士,可见谅祚对汉族有才华者之重视程度。

谅祚所推行的“去蕃就汉,行中国礼”的全面汉化政策,遍及衣冠器物、礼乐制度、官制设立及思想观念诸方面,对西夏政权巩固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 乾顺的汉化思想。夏崇宗乾顺自登基以来,就受到后族梁氏的控制。永安二年(1099年),乾顺年满16岁,梁太后仍然禁其亲政。辽道宗一向对梁太后不满,曾多次拒绝西夏请求,后借口梁太后言语不恭,以毒酒处死,扶持乾顺登上九五之尊。乾顺较有作为,登基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内政、外交改革,使西夏步入封建化轨道。社会安定,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取得明显进步。乾顺汉化思想与行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模仿汉族“分封制”。自元昊建国,宫廷内皇族与后族之间矛盾重重,并且日趋尖锐,特别是在梁氏集团“一门二后”专政的过程中达到白热化程度。后族的势力急剧上升,皇族势力受到极大威胁。乾顺亲政之后,为了巩固皇权,增强皇族势力,大力模仿汉族“分封制”,渐次实行封侯加爵。夏贞观三年(1103

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21 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②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20 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36页。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4001页。

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第14002页。

⑤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21 龚世俊等校证,第243页。

年)九月,乾顺封弟察哥为晋国王。他担任都统军镇衙头时,曾向乾顺建议“自古行师,步骑并利。国家用‘铁鹞子’以驰骋中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值‘神臂弓’,步奚自溃。盖可以守常,不可以御变也。夫兵在审机,法贵善变。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牌,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戎则分蕃而进。以我国之短,易中国之长,如此则无敌于天下矣”。由此可见察哥远见卓识,确具非凡的军事才能,为此乾顺封他为晋国王。夏元德二年(1120年)十一月,乾顺封宗室子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秉常被囚于木寨之时,仁忠的父亲景思紧随秉常左右竭力保护,以防罔萌讹等加害,秉常异常感激之。复位之后,他欲重用景思,却遭到梁氏家族反对。景思去世之时,仁忠二人尚且年幼。二人长大后,俱通晓蕃汉文字,且文思敏捷,善歌咏物,深得乾顺青睐。分别封他们为礼部郎中和河南转运使,后加封濮王和舒王。乾顺分封藩王的措施,与汉高祖刘邦分封同姓王措施的初衷相同,目的都在于加强皇族权利,削弱外戚势力。这对于维护封建朝廷内部统一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后患也不言而喻。汉高祖大封同姓王的范围不断扩大,造成封王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结果酿成“七国之乱”。同样,乾顺的上述措施也为夏仁宗乾祐时期的“西平王之乱”埋下了祸根。

其二,建国学。自元昊创建蕃学,国中由蕃学进诸州者多至数百人,而汉学日坏,出现了“士皆尚气矜,鲜廉耻”的局面。这种现象使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乾顺深感忧虑。夏贞观元年(1101年),御史中丞薛元礼上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如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①乾顺采纳了薛元礼的建议,于蕃学之外特建国学,并置教授,选拔皇族子弟300人入学,并“立养贤务以廩食之”^②。乾顺的这一措施对于儒学在西夏的推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与谅祚用汉礼、求赐经书不能相提并论。这一措施“确立了儒学在西夏政治文化中的至尊地位,为西夏的乾顺、仁孝两朝百年盛世奠定了人才储备的基础。”^③当

然,乾顺始建国学,并非一帆风顺,与历史上众多少数民族汉化措施一样,也曾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最为典型的是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上疏“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④。他反对因为养贤重学而使军备废弛的措施。虽然历史证明,其所言不无道理,但这并未改变乾顺推行汉化的决心。他继续崇尚儒学,并身体力行写下汉文诗《灵芝歌》。由于国学的建立,儒学在西夏境内得以全面推广,为仁孝时期将儒学推上巅峰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仁孝的汉化思想。夏大德五年(1139年)六月,国主乾顺卒,长子仁孝继立。仁孝为乾顺的妃子曹氏所生,辽成安公主见而爱之,请名“仁孝”。仁孝继位之后,深感后族擅权的危害,因此他尊母任氏、曹氏并为两宫太后,“两母并尊,奉养礼制如一”,使两宫势均力敌,无法再干预朝政。翌年二月,仁孝立罔氏为后。罔氏属于西夏的实力派,而罔氏本人又聪慧知书,爱行汉礼。仁孝立罔氏为后,不仅加强了皇族势力,也为以后推行各项汉化措施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汉化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政权机构进行了重组改革。到仁孝时期,西夏封建生产关系有了显著发展,从而推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封建化步伐。早在乾顺时期,便开始改革封建政权。然而,乾顺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官职名称的改革,仅用汉语,不再出现蕃语称呼;二是实行封王制。到仁孝时期,除了继续进行以上两项改革之外,还从法律上确立封建官僚等级制。他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以下六类:1. 上品:中书、枢密;2. 次品: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众功德司、阁门司、御膳司、匭匣司、西凉府、镇夷郡、番和郡;3. 中品:大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堪司、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受纳司、边境监军司、宫前侍卫司、医人院、工技院,以及鸣沙军、泾原县……等地方机构;4. 下品:行宫司、举荐司、南院行宫三司、马院司,以及诸如灵武郡、银州、定远县、震武城……等地方机构;5. 末品:刻字司、造案司、金工司、织绢院、蕃汉乐人院、仪容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以及安远堡、讹泥寨等地方机构;6. 不入品:纳言处、飞禽受纳处、秘书监、工技院总管、蕃汉大学院。^⑤至此,西夏官职机构经过多次修改与补充,已臻完善与定型,与中原王朝相差无几,进入成熟时期。

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1 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59页。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第14019页。

③ 李范文《西夏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8页。

④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2 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71页。

⑤ 西夏文法典《天盛旧改新定律令》第十章。转引自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蔚《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二是“心慕正朔”兴科举、办学校。夏人庆元年(1144年)五月,仁孝遣使入贺天申节。由于靖康之变宋朝南移,为金人所阻,夏国贺使不至中国者近二十年。然仁孝心慕正朔,深谙汉族礼仪制度,遂遣使贺节。并于同年六月,下令各州县设立学校,命令各地官僚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学说。“国中王室弟子至三千人。”后来又“复立小学于禁中”,“凡宗室子孙七岁到十五岁皆得入学,设教授,仁孝与后罔氏亦时为条教导之。”^①夏人庆二年(1145年)七月,仁孝模仿中原王朝的仪式,设立太学,并亲视之。故吴广成感言“仁孝生长西蕃,先立学校以教与国;复立小学以化于宫。又慕大汉休风,特起太学,亲临释奠,虽古贤主何以加!”^②人庆四年(1147年)八月,仁孝建立唱名法,亲自在宫中测试举人。此外,他还设立童子科,让学习优秀的子弟少年登科。从此盛行于中原王朝的科举制度在西夏得以广泛推行,成为西夏王朝选拔官员的制度。人庆五年(1148年)三月,建立内学,仁孝亲自选拔儒家学派的学者。从乾顺建立国学到仁孝设科取士,置太学、内学等,儒家文化在西夏的传播更为深入,在西夏政权中发挥的作用也愈来愈大。所选拔的许多知书达理、具有深厚儒家文化功底的朝廷官员,为西夏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封建化作出重要贡献。

三是尊崇孔子。夏人庆三年(1146年)三月,仁孝“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③。西夏僻处偏隅,但仁孝能做到“尊礼先师”,“为世教振颓风,以圣学维国本”^④,这在此前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确系独一无二,足见仁孝推行儒学的魄力。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先驱,汉族皇帝推崇孔子,仅从修庙祀、修学堂等方面入手,在汉文化中,孔子也至高被称为圣人。然而夏仁宗仁孝却封孔子为皇帝,表明他推崇儒学的决心。

与元昊民族关系思想相比,仁孝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以下两大特点:一是开明性。元昊学习汉文化态度一向为有限度的吸收,尚有一定程度的抵制。然而,仁孝则全盘汉化,上到国家政治体制,下到自身衣着服饰。当然,这虽与西夏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有关,但更多的是仁孝自身对汉文化在西夏中的作用的有关。二是变革性。西夏社会发展到仁孝时期,国家

相对稳定,国内改革迫在眉睫,而且从内到外都具备了改革的条件。政治上政府机构调整,文化上立孔子为帝,无一不具有明显的变革性。

但是,仁孝在推行汉化政策时,也有不当之处。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汉化措施,显然大大削弱了西夏人固有的尚武精神,朝内粉饰太平的现象也逐日加深。这反映出西夏统治阶级已渐趋腐败,争权夺利、贪污贿赂盛行。如晋王察哥“广起第宅,横征。多诛求,蕃汉苦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统治阶级的声色犬马、恣意挥霍严重败坏了党项人固有的质朴、勤劳、勇敢的社会风气。此外,从民族同化的角度来看,仁孝推行汉化改革方式是强迫同化。仁孝采用政治手段迫使党项人接受汉文化,固然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但却建立在党项人民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之上。

(二) 后党的思想

谅祚诛杀没藏氏,立梁氏为后。梁太后把持国政,于乾道元年(1068年)任其弟梁乙埋为国相,并将全部国政交之管理。梁乙埋当政后,把自己的子弟、亲信全部安插到朝廷的重要部门,“于是诸梁权日甚”^⑤。两代梁氏集团统治西夏前后达30余年,他们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举措就是恢复蕃礼。梁氏虽属汉人,但执政后却倒行逆施,为争取党项贵族及部落的支持,取消谅祚推行的汉礼,全面恢复蕃礼。夏乾道二年(1069年)“八月,表请去汉仪,复用蕃礼,从之”^⑥。据《西夏书事》卷24记载,“秋七月,复蕃礼。梁氏不乐汉礼,伪为秉常表,请复本国旧蕃仪,神宗许之”^⑦。清代吴广成认为:梁氏本中国人,不乐汉礼,喜用胡俗,倒行逆施。除此之外,恢复蕃礼还表现在排斥异己,打击皇族势力。西夏开国老将嵬名浪遇,深谙边事,精通变法,并担任“都统军”之职,因为不满梁氏集团的专政以及倒行逆施,于天赐礼法盛国庆四年(1073年)被罢免都统军职位。公元1074年去世之前,还上表“擢用忠良,勿犯中国”^⑧的言论,然而诸梁恶之不以闻。“兴庆府之变”充分体现了以梁氏为代表的后党反对汉化的思想。谅祚之子秉常深受汉族文明的影响,一心推崇汉礼,即使在进攻北宋时,都不忘学习汉文化。史载“秉常连次犯边,每得汉人,辄访以中国制度,心窃好之,乃下令国中悉去蕃仪,复行汉礼”。引起了梁氏的极端不满,“梁乙埋与其母亦相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第14024页。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第14024页。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第14025页。

④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6 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17页。

⑤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22 龚世俊等校证,第252页。

⑥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22 龚世俊等校证,第255页。

⑦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24 龚世俊等校证,第280页。

⑧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24 龚世俊等校证,第274页。

继劝秉常“不听”^①。秉常执意推行汉礼遭到了梁氏集团的憎恨,乙埋等皆“不悦”。汉族人士李清由于不忘故国,说服秉常以河南之地归附宋朝。秉常一心向往汉族文明,于是答应李清的请求。然而,事情很快败露。梁氏与罔萌讹谋划设置酒宴而诛杀李清。李清死后,又将秉常囚禁于兴庆府。后党势力暂时击败了帝党势力,秉常与李清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兴庆府之变”在西夏掀起轩然大波,西夏政局出现了新变化,各个利益集团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变。秉常被囚后,这支势力群龙无首,亲信党羽拥兵自重,处于备战状态。梁乙埋企图收买各级党羽,但诸党不从,造成国内大乱。吐蕃贵族禹臧花麻坚定地站在帝党一边。禹臧花麻原为吐蕃首领,凉祚时期统治西使城。由于遭受北宋秦州钤辖向宝的进攻,以“西使城及兰州一带土地举籍献夏国”。凉祚大喜,“以宗女妻花麻”^②,并封其为驸马,令其继续管理西使城。秉常失位后,禹臧花麻极其不满,移兵熙州,请讨梁氏。并称“夏国母子不协杀其重臣,若发兵来讨,请举族以应。”^③说明帝党势力在不断增强。总之,梁氏恢复蕃礼的措施,不仅是蕃、汉两种礼仪之争,而是后族与皇族、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权力较量。

仁孝实行一系列汉化措施,使西夏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封建文化也有了较大提高。但在这太平盛世之下却酝酿着一场篡权分国的斗争,即以任得敬为代表的后族和以仁孝为代表的皇族之间的生死较量。

任得敬为汉族人,时任宋朝西安州通判。夏大德三年(1137年),夏兵攻取西安,任得敬出降,仍被乾顺任命为权知州事。同年,任得敬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乾顺为妃,被乾顺封为静州防御使。任氏庄重寡言,深得乾顺宠爱,与曹氏并居妃位,相处十分和睦。任得敬野心很大,想将其女儿立为皇后,经常以财物贿赂朝中大臣,并买通御史大夫芭里祖仁。芭里祖仁向乾顺进言“古者天子取后,藩国来媵,诸侯一娶九女,盖奉宗庙,广继嗣,阴教之职不可缺,中宫之位不可虚也。伏见陛下两妃并立,位号相夷,而五嫡以统之,则势必近争情,且生妒。岂所以防淫塞祸乱乎?今宜择簪名家,勋庸世族,素优才行,配合坤仪,庶几上协神祇之心,下副臣民之望。”^④乾顺询问群臣,都认为门第才德无过任妃,遂册立任氏为皇后,又擢升任得敬为静州都统军。

仁孝继位后,执行“以事辽之礼事金”的外交政

策,统军萧合达快快不自适,又赶上辽成安公主病卒,遂据夏州发动叛乱。萧合达在发动叛乱前,曾派人携重币与邻近各州联络,准备举兵同叛,然各州州主或拒之不纳,或将使臣抓获交与朝廷。唯任得敬热情接待使人,并详细询问萧合达举兵叛乱情况,获得许多机密,遂上表仁孝称“贼素无谋,众皆乌合,所恃者契丹余部,以威里连谋,然其势易离也。陛下诚下令安抚,赦其已往,许其自新,约还旧部,给以资粮,当必有响应者。又,贼顿兵灵武,已逾两月,今新破盐州,士气骄甚,夏州距灵武五百里,安然无备,臣请以州兵合诸将袭之,可获全胜。”^⑤仁孝同意后,任得敬率兵出师一举攻下空虚的夏州,后一鼓作气擒拿萧合达。

由于任得敬平叛萧合达叛乱有功,仁孝将其进封为西平公,赏赐甚为优厚。然任得敬官位愈高野心愈大。夏人庆四年(1147年),他通过女儿任太后授意群臣请求入朝,遭到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的强烈反对。热辣公济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任得敬入朝之事被暂时搁置下来。一年后,中书令嵬名仁忠去世,御史大夫热辣公济告老还乡,任得敬入朝的路途便无人阻拦,再加嵬名察哥出手相助,任得敬在仁孝面前日渐得宠,遂于夏天盛二年(1150年)出任中书令,数年后升为国相。从此,西夏的大权一步步被任得敬掌控。天盛十二年(1160年),任得敬自封楚王,出入礼仪随从,几近皇帝仁孝。御史中丞热辣公济上书弹劾之,竟被其扣压不报。任得敬不仅凌辱朝廷儒士,而且对仁孝尊崇儒学、办学校、兴科举的举措也甚为不满。他曾上表仁孝“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竽,靡廪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盖此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⑥任得敬之所以竭力反对汉化政策,一是因为他本人并非科举士子,对科举取士深恶痛绝;二是因为科举取士妨碍他任人唯亲、网罗亲信。

当时,汉化和封建化已是大势所趋,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对任得敬专横跋扈、擅权分国的举动,仁孝早已察觉并采取了措施。天盛十二年(1160年),任得敬上书欲取消学校,废除科举制,仁孝不仅没有答应,反而于次年正月设立翰林院,任命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学子为翰林院学士。此外,仁孝还任用大批蕃汉治国人才,安置于朝廷要位以遏制任得敬发展私人势力。

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24 龚世俊等校证,第280页。

②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20 龚世俊等校证,第238页。

③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25 龚世俊等校证,第283页。

④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5 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03页。

⑤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5 龚世俊等校证,第408页。

⑥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6 龚世俊等校证,第424页。

然而,任得敬却“邪谋日甚,凌铄宗亲,诛锄异己”^①,竟向仁孝提出分国的无理要求,让仁孝去瓜、沙一带,自己居灵、夏地区。仁孝无奈于夏乾祐元年(1170年)派遣焦景颜奔赴金国,以为任得敬请求册封为名,实则是向宗主国通报任得敬欲擅权分国的阴谋。金主认为“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主本意。况夏国称蕃已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耶?若彼不能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②。赐仁孝诏书曰“自我国家勘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划疆于乃父,继则赐命于尔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纪,蕃臣之礼既务践修,先业所传亦当固守。今兹请命,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尔。所有贡物,已令发回”^③。任得敬求金朝册封未被批准后,开始有了惧怕之心。同年八月,在南院宣徽使任德仁、殿前太尉任德聪的配合下,密谋发动宫廷政变,被仁孝察觉。仁孝向金请求出兵相助。在金国的帮助下,仁孝将任得敬及其党羽一网打尽。至此,持续百年的后党与帝党的斗争最后以帝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帝党与后党围绕“夷”、“夏”之争,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长期性。从1060年谅祚开始反对没藏讹宠侵占宋朝耕地,到1179年仁孝诛杀任得敬,前后一百多年,经西夏皇帝谅祚、秉常、乾顺、仁孝四代的努力,终于打败后党势力。二是复杂性。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夏”与“夷”的争辩,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的一次思想交锋。围绕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而出现的思想交锋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这种争辩却超出了思想斗争的范围,与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冲击了应有的主题,使此争辩成为皇族与后族之间的宫廷斗争,从而使这场思想斗争变得十分复杂,难以通过正常的方式解决。三是艰巨性。任何民族都有坚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需求。因此,要求党项族彻底放弃草原文化从而全面接受汉文化,必然要经历艰难过程。皇族代表们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同时也忽略了后族尚具备强大的能量。后族显然极不情愿接受汉文化,秉常被囚,李清被杀,就是最明显的例证。皇族们排除障碍、历经各种磨难、历经百年全力推行汉化,可谓艰巨。

三、西夏末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西夏末期,皇位更替比较频繁。短短三十余年的时间,历经了桓宗纯祐、襄宗安全、神宗遵顼、献宗德旺、末主睨五位君主,与前160余年在位皇帝数目相等。而且这几位国君不是废主自立,就是宫中缺乏

贤哲而勉强继位。由于时间短暂,且处于乱世,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言论没被记载下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实践活动和零星文献资料勾勒其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轮廓。

(一)“睦邻金朝”

仁孝之子纯祐继位,在承享仁孝一手开创的太平盛世的同时,基本沿袭了“睦邻金朝”思想,继续执行仁孝的外交政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承认金的宗主国地位,不断派遣使臣入金。据《西夏书事》及《金史·交聘表下》记载,纯祐执政十四年间(公元1193—1206年),入金使者达三十多次,一年中少则两次,多则四次。多数是在金正旦、天寿节及赏赐日,西夏派遣使节表示祝贺和致谢。这不仅表明纯祐时期两国无战争纠纷,而且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这一时期双方的经济贸易主要通过贡使和榷场两种方式进行,以榷场贸易为主。夏国输出的有来自西域的珠宝、香料以及西夏的特产中药(柴胡、大黄等)、畜产品(马、羊、驼)等,而金国则输出铁器、瓷器、纸张、书籍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这种双边贸易促进了双方产品的交流及经济发展。

纯祐能够执行“睦邻金朝”的路线,与金和平相处,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下几点尤为重要。首先,双方此时无大的利益冲突,且无第三者介入。这一时期,中国南部是软弱的南宋朝廷,偏安一隅不图振作,只是一味向金割地、纳币、称侄。金无消灭南宋的力量,南宋亦无北伐的图谋。两者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基本没有外交往来。中国北方是势力逐日壮大的蒙古诸部,各部落之间相互争战,在军事上无暇顾及夏、金王朝。因此,这种均衡的局势促使中国形成了夏、金两个政权和平相处的局面。这种大格局的稳定,是夏金双方稳定的前提。其次,西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与南宋朝廷隔绝,决定它在经济上只能仰仗于金。西夏与金之间开设榷场贸易,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夏经济的不足。但如果因战争中断这一贸易,失去用以有利自身的重大经济利益,无论如何都划不来。因此纯祐十分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第三,夏金双方都是行将就木的腐朽之国,都无力挑起战争。西夏在封建化过程中,官僚集团贪污盛行,日益腐败,致使西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而且,由于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造成国内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而此时的金朝也同样国力衰微,统治集团矛盾重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明显。因此,双方都无意再起争端。

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卷37 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37页。

② 《金史》卷134《夏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69页。

③ 《金史》卷134《夏国传》,第2869页。

(二)“附蒙抗金”

这一时期,北方的蒙古势力正逐步兴起,然而这并未引起西夏统治集团的警惕,反而爆发内讧。1206年,觊觎皇位已久的镇夷郡王安全,与纯祐的母亲皇太后罗氏废除纯祐自立为帝,是为襄宗。安全在位六年,其间蒙古两次进攻,首都中庆府被围,西夏向金求援而遭拒绝,无奈只好纳女请和。此后,安全不再执行“睦邻金朝”的思想与政策,转而臣服蒙古、抗击金朝。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外交政策,影响到以后的遵项,西夏政权自此衰落。

我们知道,到安全、遵项篡位时,夏、金两国已维持了八十余年的宗主关系。其间,两国虽因土地、人口、榷场贸易等原因发生过纠纷,但总体来看,还维持着互通有无、相互支持的和平友好关系。西夏之所以在蒙古势力兴起、西夏发生内讧之际改变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和外交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安全废主自立给两国关系蒙上阴影。安全发动宫廷政变,废纯祐自立为帝,属于以下犯上,严重违背了封建帝制传嗣之伦理纲常。为此金朝始终抱着谨慎的态度,对安全的册封犹豫不决。安全自立为帝后,太后罗氏遣御史大夫罔佐执中奉表至金,请求册封,金朝多次诘责废立之故。经过三次请求后,金才册封安全为夏国王。此后两国虽仍保持礼节性往来,但金对安全始终态度冷漠,经济上亦取消对夏之优惠政策,两国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蒙古入侵西夏,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第二,蒙古攻夏,金主抱“隔岸观火”的态度。1205年,铁木真首次入侵西夏,大肆掠夺,拉开侵略西夏的序幕。1207年,成吉思汗又借口西夏不纳贡和安全废主自立,第二次进攻西夏。1210年,又发动第三次侵夏战争,蒙古军队长驱直入,进攻克夷门,围攻中兴府。安全无奈向金伸出了求援之手,金朝国内普遍认为,西夏如果灭亡,蒙古下一步必会攻打金国,如与西夏联手对付蒙古,首尾夹击,进可攻,退可守。而金主完颜永济却说“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①不知唇亡齿寒之理,拒绝出兵相救,从而促使安全采取臣服蒙古、附蒙攻金的思想与外交政策。第三,西夏传统的“视三国之强弱以为异同”思想的影响。自李继迁以来,西夏所要处理的对外关系始终在三国之间展开,即辽、北宋、西夏;金、南宋、西夏;蒙古、金、西夏。西夏统治者一贯采取联盟强国、进攻第三方的思想与政策,如继迁“假借其援,以为后图”联盟辽朝的思想,乾顺“以事辽之礼事金”臣服金朝的思想。同样,安全、遵项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希望

摆脱衰微的金朝,投靠新崛起的蒙古,继续西夏的统治。但是,这种思想和外交政策使西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安全、遵项产生“附蒙抗金”思想之后,就开始对金发动军事进攻。这场进攻历时十三年,大小战争共四十余次。频繁战争给西夏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大大削弱了夏国军事实力,客观上为蒙古灭夏创造了条件;并使西夏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夏金关系破裂后,金关闭榷场,停止对夏贸易,加重了西夏经济上的困境,埋下了西夏亡国的祸根。

(三)“联金抗蒙”

很具讽刺意味的是,遵项“附蒙攻金”并没能挽救西夏,反而引起朝内极端不满。同时也因为帮助蒙古攻金屡屡失利而倍受蒙古谴责。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遵项感到惶恐不安,遂于1223年禅位于次子德旺。德旺继位后,意识到强大的蒙古势力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决心摆脱蒙古的奴役,由先前“附蒙攻金”转变为“联金抗蒙”思想,遂遣使结交漠北诸部,组成抗击蒙古的联盟,抵御蒙古入侵。此外,同年十月,遣使入金,奉表修好,“自称兄弟之国”^②,并达成如遇他国入侵,相互声援的协议。然而,此时西夏早已陷入绝境,终究阻挡不了蒙古亡夏的决心,摆脱不了西夏亡国的厄运。

四、结 语

综合前面对西夏前期、中期和末期民族关系思想的梳理和分析,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西夏民族关系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西夏统一我国西北地区,成为辽宋夏金时期的一个重要角色,对当时中国民族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其次,西夏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有助于拓宽、深化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因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包括中国各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一些少数民族的政治家拥有许多与汉族政治家和思想家相同或类似的基本观点,有的认识甚至比汉族政治家和思想家都要深刻,都要精辟。^③因此,深入挖掘、系统梳理和细致研究西夏民族关系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二,“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融入华夏文化的一种现象。西夏时期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认真思考和认识汉化问题,因此,汉化问题是西夏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考察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化问题及汉化程度,“主要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设定标准:一是少数民族的主流思想;二是

① 《大金国志校证》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8页。

② 《金史》卷134《外国传上·西夏传》第2869页。

③ 崔明德《略谈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烟台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上层人物的合作程度,是否采用汉制;三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水平及生活习俗等方面是否与汉族接近;四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是否并用,少数民族是否讲汉语;五是在血统上是否溶为一体”^①。按照这几条标准,西夏前期继迁、元昊只是有限度的汉化,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仍然坚守本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处处显示与汉族的差异;西夏中期,在乾顺、仁孝全面汉化思想指导下,从制度、文化到服饰等各方面,都对党项族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然而,改革并不顺利,保守派如后党集团,他们严格坚守党项文化的底线,对于任何触动他们利益的变革都要坚决阻挡甚至主动出击。而改革派如仁孝等则以“以夏变夷”为指导思想,大胆变革党项旧俗,全面向汉文化看齐,彻底走上了汉化之路。

其三,“视三国之强弱以为异同”是西夏一以贯之的思想。西夏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建国到灭亡的190年间,总是处于或与辽、北宋或与金、南宋

或与蒙古、金的三足鼎立格局中,必须时刻考虑如何在三角关系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机遇,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西夏又处于我国西北地区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只能仰仗于别的政权。这些都迫使西夏只能与其他政权结盟,以获得对方的支持。从李继迁“假借其援,以为后图”联盟辽朝的思想,到后期“睦邻金朝”、“附蒙攻金”、“联金抗蒙”思想及其实践,无一不是这一思想最好的解释。

其四,对西夏民族关系思想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如继迁、元昊的大一统思想,突破了传统中原观念的束缚,超越传统的“中国”观念,认为少数民族也属于正统,把中华一体思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乾顺、仁孝的汉化思想,抛弃了党项羌文化中的一些愚昧落后成分。而那种“恢复蕃礼”等思想与做法,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An Analysis of the Ideas of Nationality Relations in Xixia

SHI Jing-xian, CUI Ming-de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Xixia was a minority regime in northwestern China. After the government was set up, domestic nationalities in Xixia are numerous with uneven level of development. Outside, Xixia had to strive for orthodoxy with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t the risk of attacks by it and its allies – the Liao Dynasty and Turbo. At home and abroad, Xixia was facing complicated ethnic problems. Being a minority regime ruling northwestern China, besides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thoughts of national relations of former generations, the rulers of Xixia formed a new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e then nationality relationship. Their thoughts of nationality relations not only served as references for the Yuan Dynasty but also have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ationality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Xixia; Dangxiang; thoughts of nationality relations

[责任编辑:李国栋]

^① 马晓丽、崔明德《对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问题的总体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